

中國崛起：修正型強權或現狀型國家？

China's Rising: A Revisionist Power or a Status Quo State?

宋興洲 *Sung, Hsing-Chou*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中國經濟方面的崛起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但「中國是否因此無論在意識形態、經濟和軍事上均對美國造成威脅」這個議題辯論已久。本文首先從「修正型」國家及「現狀型」國家這兩個概念來探討，但發現這兩個概念在理論上仍有模糊之處。不過，以認知和形象作為依據，也就是從心理層面的角度著眼，即使上述兩個概念的定義不明確，論述者在態度和評論上早就有了自己的答案。其次，從三個角度探討美國對中國的負面形象：國會、平面媒體及中國威脅論。接著，討論中國實際參與國際組織的情形。然後，分析中國與亞洲國家接觸的狀況。最後，本文的結論是，如果中國遵循「和平與發展」原則，繼續與美國對話和接觸，那麼也許美國不再將中國視為威脅。

China's rising in rapid economic growth is an unarguable fact. However, the issue that whether China has become a threat to the US in terms of ideology, economy and military has been debate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definitions of two concepts (a revisionist state and a status quo state) and finds that they are theoretically vague. Although the meanings of both concepts are uncertain, the analysts and observers will have their own answers from the mechanisms of perceptions and images when they want to identify a country. Second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gative images of China in the U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Congress, the print media and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Thirdly, it discusse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Fourthl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ina's engagement with Asian countries. Finall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f China follows the principles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ntinues its dialogue and engagement with the US, then probably the US will not see China as a threat any more.

關鍵詞：中國崛起、修正型強權、現狀型國家、中國威脅

Keywords: China's rising, a revisionist power, a status quo state, China threat

壹、前言

中國自 1978 年推動經濟改革後，經濟成長快速，國民所得增加，外國投資也水漲船高。就土地面積 959 萬 6960 平方公里、人口近 13 億的中國而言，其全國總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於 2004 年已超過 1 兆 6500 億美元。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第 6 大經濟體，除了其 GDP 預期將以加速的比率成長外，也是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接受國，於 2004 年 2 月時總 FDI 金額達到 5098 億美元。另外，中國是世界上第 3 大貿易國（僅次於美國與德國），2003 年的對外貿易額為 8512 億美元。¹

中國驚人的經濟表現，一般俗稱「中國崛起」（China's rising）似乎並不為過。但是，成為經濟強權的同時，中國未來的去向為何卻引來他國，尤其是美國，的憂慮。有趣的是，根據 1950 年代到 1990 年代期間學者們的研究發現，中國與美國相互之間的認知和形象（perceptions and images）則呈現正反兩面同時俱存（既愛且恨）並矛盾（ambivalence and contradictory）的情形。美國人既羅曼蒂克化且妖魔化（romanticized and demonized）中國及中國人，將其想像成：有教養、學識但又專制、野蠻；純樸卻迷信；固執但務實、冷靜卻殘酷、保守又極端、平靜、內斂但好鬥、挑釁；弱小卻可怕……等等。相對地，中國人一方面尊敬並嘗試模仿美國，另一方面卻對美國社會和文化感到反感（厭惡）並鄙視美國對外行爲。對許多中國人而言，美國就是「美帝」。²

有時，這些矛盾且雙重的形象同時存在於中、美各國的集體腦海中，而在其他的時期裡，某一套刻板印象盛行並持續一段時間後，卻在另一段期間又逆轉回到相反的方向。不管是什麼方向，學者們注意到這種正反兩面的矛盾在相

¹ Wu Ming Chu, "A Note on ASEAN's Strategy towards 10+1: Strengthening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re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ASEAN's Affiliated NGO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Governance: Lessons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Grand Hotel, Taipei, on March 12, 2005, p. 127.

² David Shambaugh, "Introduction: Imaging Demons: the rise of negative imagery in US-China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35 (2003), pp. 235-236.

互形象中會產生出「愛—恨併發症」。而這種雙重併發症直接會在兩國關係上進入到不斷重複的循環之中：相互著迷（mutual enchantment）→提升期望→未達到期望→醒悟與清醒（disillusion and disenchantment）→反唇相譏與擴大（recrimination and fallout）→分離與敵視（separation and hostility）→重新擁抱並再相互著迷（re-embrace and re-enchantment）。如此，這種模式一直循環下去。雖然這並非機械式的一成不變或者可以事先預測，但中美關係在上個（廿）世紀則傾向於照著這種形態進行，雙方關係也因而一直在友好（和睦）與敵意（敵對）（amity and enmity）之間變換。³

如果上述中美關係是隨著認知和形象的改變而發展，那麼令人好奇的是，對他方認知的轉變又是根據什麼？有人會說，這往往是根據「事實」（facts）的發展而起了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通常假定我們對現實的了解是直接來自於現實本身的性質。因而，以下兩點已經成為常識：（1）某些事務是事實而對其相反的肯定則不是事實；（2）如果我們可以確定事實，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某些結論。對科學家和做決定的人而言，資訊蒐集的目的就是去決定事實，然後根據這些事實便得到有關現實的知識。⁴

不過，研究認知的學者們（perceptual theorists）則不接受這種簡單的知識概念。他們認為，知識有其主觀和客觀的成份在內：事實本身不會替自己說話，而是由每一位詮釋者從他自己分析的觀點給予其意義。並且，事實並非從現實中繁衍而生。事實只不過是現實中的特殊片段而已，是由觀察者認為重要而選擇出來的，至於其他片段的資訊則因沒有重要性而被捨棄掉。系統論大師伊斯頓（David Easton）認為，「事實只不過是依據理論興趣（a theoretical interest）而對現實做一種特殊安排（a particular ordering of reality）而已」。所以，「事實」是主觀上地被界定，並且它們本身就是認知的一種現象。如果事實本身就是認知，那麼當認知遇到事實時，認知就不可能被矯正。⁵

由於事實是根據認知被認定，而美國對中國又向來存在著正反兩面矛盾的

³ Shambaugh, *op. cit.*, p. 236.

⁴ Steven J. Rosen and Walter S. Jones,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rd e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Winthrop Publishers, Inc., 1980), p. 188.

⁵ Rosen and Jones, *op. cit.*, p. 189.

雙重態度，所以我們不難了解，即使是面對相同的「事實」，但在中美雙方各自的認知下就會有時產生契合、有時則發生衝突。在此前題下，本文的目的即是探討美國面對中國崛起所產生的形象為何，並評估中國的表現是否應驗了美國對中國的形象。以下，首先就現狀型國家與修正型國家在概念上提出澄清；其次就中國在美國人心中的負面形象分為三部分討論：國會的看法、媒體的認知、及中國威脅論；再者就中國的表現予以評估；之後就中國在亞洲實際的作為進行分析，最後提出本文的結論。

貳、現狀型國家與修正型國家

如果中國的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那麼美國視其為「修正型國家」(a revisionist state) 還是「現狀型國家」(a status quo state)？顯然地，某些美國政治人物把中國視為「修正型」國家。例如，美國現任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 早在布希尚未當選總統之前就撰文論及：「中國憎恨美國在亞太區域的角色。這表示中國並非一個『現狀型』強權，而是一個想要達成其喜好地改變亞洲權力平衡。單獨就這點足以使其成為戰略的競爭者，而不是戰略的夥伴」。

6

但何謂修正型或現狀型國家？雖然這兩個概念在國際關係理論的建立上以及在政策世界中的論述中均佔有核心的位置，但在定義上則不僅模糊而且理論化不足。根據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說法，「(採行維持)現狀的政策，出現在歷史上某個時期，目標是維持權力的分配」。⁷現狀的政策是相對於任何「兩個或更多國家之間權力關係的倒轉，例如，降低 A 國從第一級到第二級的權力，並提升 B 國到 A 國原先擁有的卓越地位。」然而，微小的調整(minor adjustments)，也就是「涉及國家之間相對權力地位沒有更動，與現狀

⁶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0), p. 56.

⁷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p. 46.

政策完全相容」。⁸換句話說，微小的調整，只要不影響國家之間權力的相對關係，仍可視為與現狀政策沒有兩樣。不過，摩根索並沒有進一步說明：(1) 如何決定一個國家是否有慾望想要微小或較大 (major) 的調整；(2) 第一級或第二級國家到底具體地像什麼樣子；(3) 是否這種調整的慾望可以作為國家實際行為的好的指標。

「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 理論家奧坎斯基 (A.F.K. Organski) 與古格勒 (Jacet Kugler) 把現狀型國家界定為那些參與設計「遊戲規則」並從這些規則中得利的國家，而挑戰者 (如修正型國家) 則想要「為他們自己在國際社會中一個新的地位」可對應於 (commensurate with) 他們的權力。修正型國家對於他們「在體系中的地位」表達出「普遍的不滿」。他們有「慾望重新起草規則，使規則能將國家之間的關係 (重新) 運作」。⁹比較而言，摩根索與奧坎斯基、古格勒兩位的定義不同。權力轉移的定義是把現狀部分看作是意圖 (intentions) 的結果，而不僅是能力 (capabilities) 而已。因此，崛起的國家當其相對權力增強時是否意圖或想要改變規則？如果國家沒有意圖，即使權力增強，也不被稱為是修正型國家。但摩根索的定義則強調權力分配的改變 (這是假定在規則改變後發生)。對摩根索而言，任何崛起的國家根據定義就是修正型國家，因為它想要改變全球的權力分配以增加其本身的權力。而對奧坎斯基與古格勒而言，只有那些想要改變規則以改變權力分配的崛起國家才被稱為非現狀型強權。不過，奧坎斯基與古格勒的定義中並沒有說明：(1) 什麼原則實際治理著國際關係；(2) 是否這些原則廣泛地被接受；(3) 我們又應當如何確認；(4) 從國家領導者角度那些指標可用來決定其認為該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

史基威勒 (Randall Schweller) 則提出修正型與現狀型國家的類型，可以允許某些程度上的變化。基本上，「修正型國家對它們所垂涎的比其目前所擁有的要看得價值比較高……他們將會運用軍事力量來改變現狀並擴張其價值。」

⁸ Ibid.

⁹ A.F.K. Organski and Jacet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9-20, 23.

¹⁰換句話說，修正型國家比較不會珍惜目前所擁有的而心滿意足，反而想要改變現狀以獲得更多。根據史基威勒的定義，如果中國只是利用其經濟發展作為增加其在亞太地區的政治影響力，那麼也許中國不應稱為修正型國家。不過，對於史基威勒的定義，我們不清楚的是：在任何特定期間內，除了現存的權力結構外，到底現狀的組成部分為何。

當然，並非現實學派的學者皆使用「現狀—修正」的類型。例如，密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攻擊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主張，所有大國（great powers）都是修正型國家，因為他們有一種不得不使然的趨動力（也可以說是一種被迫或悲劇）去極大化其權力，為的是在無政府狀態下能達到安全的保障。¹¹至於其他現實學派的學者當中，吉爾平（Robert Gilpin）對修正型與現狀型國家提供了比較精確的討論。他把「遊戲規則」（rules of the game）畫分為比較可以操作化的成份：權力分配、威望的層級結構（the hierarchy of prestige）、以及「管理或至少可以影響國家間互動的權利與規則」。¹²所以，如果使用以上三個主要成份，那麼我們就可以正當地提出以下的問題並決定某個國家是否基本上追求現狀式或修正式的外交政策。第一，對於特別的規則，如國家間外交、安全制度及國際經濟制度，國家領導者如何談論及行爲？第二，對於全球性或區域性的權力分配，國家領導者如何談論及行爲？第三，對於威望層級結構，國家領導者如何談論及行爲？對於吉爾平而言，修正型國家基本上尋求以上三個要素的改變。如果少於這些條件，那麼稱某個國家屬於修正型或非現狀型國家就會引起爭議。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發現，根據某國的外交政策偏好和行動以決定其是否為現狀型或修正型國家，在理論的建構和解釋上仍有明顯的不足。摩羅（James Morrow）認為，納粹德國可以說是最具典範的修正型國家。¹³季辛吉

¹⁰ Randall L. Schwel,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 105.

¹¹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p. 29.

¹²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4.

¹³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Why Write Them Dow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2000), p. 74.

(Henry Kissinger) 則把納粹德國界定為「革命型」(revolutionary) 國家(可視為修正型國家)。¹⁴但是季辛吉並沒有說明那些指標可以指明國家因不滿意現況而變為革命型國家。也許我們可以從納粹德國的例子推論,其之所以實質不滿意是因為:權力薄弱、領土被控、世界經濟中經濟損失、制度上對其權力的嚴格限制、或是國家地位不被尊重等等。因此,國際關係理論很自然地假定,當我們看到一個國家時,就會辨識出該國是否為修正型國家。然而,這種理所當然地假定在實際現況中並不是那麼明顯。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對於任何國家的行為,如果不是像納粹德國那麼極端和明顯的話,那麼指其為修正型或非現狀型國家就變得有些武斷了。上述萊斯女士斷言,中國為「非現狀型」(即修正型)國家,在沒有可靠的指標作為依據下,認知和形象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麼,美國人心目中對中國的形象如何呢?以下分三部分來探討。

參、中國在美國國會中的形象

美國國會於 1999 至 2000 年間進行辯論是否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並於 2000 年 9 月通過 H.R. 4444 法案,明定中國在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簡稱世貿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後立即生效(中國於 2001 年底正式加入世貿組織)。雖然 PNTR 最後通過,但從國會議員們的辯論中可以了解他們對中國的印象,並反映在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上。

不過,在探討議員們的辯論前,相關背景需要了解。自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美國政策陷入舉棋不定的局面,到底繼續與中國接觸 (engagement) 呢或是懲罰中國。這種左右為難的情況最明顯不過的就是,每年「對於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是否應延長(即繼續給予)最惠國待遇」的國會辯論上。這是根據傑克森—伐尼克對 1974 年貿易法修正案 (the Jackson-Vanik Amendment to the Trade Act of 1974) 的規定。該修正案要求,對於總統給予「非市場」經濟

¹⁴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57), pp. 1-2.

國最惠國待遇的決定，國會行使最後同意權（也就是，國會可以接受或拒絕總統的決定）。這種辯論「每年給政治人物和利益團體創造機會來顯示他們對美國價值的承諾並提高他們的關切」。¹⁵同時，這種辯論變得更為複雜是因為克林頓總統的搖擺不定。克林頓在其第一任上任之初把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中國人權連繫在一起，但不到一年之內，他則放棄了把中國貿易地位與其人權議題連在一起的主張。

而在 PNTR 成爲議題之前，美國國會中以及政策制定者與學術界間的辯論已激發出強烈反對中國的觀點。其中涉及到基本議題是：（1）中國經濟成長是否導致其國內政治的改革？（2）中國以其巨大潛在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會是國際社會中建構性的成員還是對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安全造成威脅？

主張美國應該繼續與中國接觸的人士不斷強調：（1）中國經濟的成長和改革已經改善許多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並增加個人自由；（2）應從長期的觀點看待中國政治制度改變的可能性；（3）雖然中國仍是威權國家，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也不斷違反聯合國憲章的人權原則，但公民社會和民主政府的興起的必要條件是要逐漸發展而成；以及（4）讓中國涉入國際制度將促進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社會，例如中國參加世貿組織將會遵守國際貿易規則，而擴展外貿和外資投入將會幫助中國經濟發展而最後促成其政治改革。¹⁶

但持相反觀點的人士則認爲：（1）經濟發展將使中國愈不依賴外在世界，並加強其能力對其他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施加經濟壓力；（2）與中國貿易的增加以及中國市場的保證將強化企業界的遊說，他們將試圖限制其政府對中國（已經開始對某些國家造成安全威脅）的戰略選擇；（3）中國正在建立軍事力量，計畫擴張其版圖、威脅台灣、成爲美國的軍事對手、降低美國阻止中國對亞洲進行侵略的軍事能力。而且，他們認爲，中國也可能利用正在成長的力

¹⁵ 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98-200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 117.

¹⁶ Stanley Lubman, "The Dragon as Demon: images of China on Capitol Hil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3, No. 40 (2004), pp. 544-545.

量扶持其外交方面的努力，在亞洲或其他地區建立結盟以對抗美國的霸權。¹⁷

其實，如果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那麼美國就必須像對待其他世貿組織成員一樣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因為世貿組織規定成員彼此對待必須平等互惠。而美國答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協商已經於 1999 年接近尾聲，因此，在這個議題上，美國國會在辯論是否給予中國 PNTR 時，引發了熱烈的爭論。

美國國會中雖然支持 PNTR 大有人在，可是持負面觀點的議員（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也不少。¹⁸尤其，當 PNTR 與相關議題連結在一起時，反對 PNTR 的議員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發揮。

首先，就經濟議題而言，反對者宣稱，這個法案只不過是一張多國公司的「願望名細表」(wish list)，期待利用廉價、「受剝削」的中國勞工，卻犧牲了國內的勞動力和增加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批評的議員也對中國信守世貿組織的承諾不表信心，因為中國過去在遵守貿易協定上記錄不良。另外，反對的議員也諷刺支持法案的議員太一廂情願地認為中國經濟的改革會帶動政治的改革，因為大部分美國在中國製造的產品都與中國政府機關和其國營企業有關，並非給中國企業家帶來利潤和促成國營企業私有化。¹⁹

其次，就一般人權而言，對經濟方面已經持反對意見的議員也毫不猶豫地批判中國違反基本的政治和宗教自由。如果給予中國 PNTR，那麼就等於同意並背書中國令人非難的行為，例如天安門事件，同時也背棄了美國價值。

再者，就宗教自由而言，反對者不遺餘力地抨擊中國迫害宗教，包括基督教和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例如 66 位主教、傳教士和信徒遭到騷擾、監禁的經歷、甚而被殺的命運。而且，中國政府也極力壓迫政治反對者。²⁰

第四，就墮胎而言，贊成「支持生命」(pro-life, 即反對墮胎)議員批評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及強迫性墮胎。

第五，就一般的國家安全而言，批評者一方面認為，美國增加與中國的貿

¹⁷ Lubman, *op. cit.*, p. 545.

¹⁸ 為節省篇幅，有關議員的發言（不論正反兩面）以及支持者的立場都省略不提。本節只是摘要持負面觀點議員們的看法。對於辯論的分析，可參考 Lubman, *op. cit.*, pp. 541-565.

¹⁹ Lubman, *op. cit.*, pp. 546-547.

²⁰ Lubman, *op. cit.*, pp. 547-549.

易將提升中國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威脅，另一方面則指控中國販售軍事技術、設備和武器。而且，也有議員認為，中國的目標就是主宰所有的亞洲，從中亞到東南亞，以及未來對付美國。

第六，就間諜和台灣問題而言，某些議員們指責中國竊取美國核武祕密、進行間諜滲透行動、以及公開聲明將武力犯台（例如，南華早報 2000 年 9 月 5 日報導，江澤明說，如果對台採取軍事行動，早一點比晚一點好）。最後，就中美關係而言，某些議員並不認為，美國可以與北京政府建立建構性的夥伴關係，因為美國在外交政策上已經與中國接觸有 20 年了，但是仍沒有多大的好處。²¹

雖然國會最後通過 PNTR 的立法並允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但那些反對中國最力的議員們仍深深感到苦惱 (gnaw)。所以，2001 年 7 月眾議院有相當人數的眾議員連署，支持一個不同意延長 PNTR 給中國的決議案，但投票結果此決議案以 259 票（反對）對 169 票（贊成）落敗，²²可見美國國會中仍有相當比例的議員對中國持不友善的態度。從美國國會的熱烈辯論中，我們不難想像，在第一位布希總統（即現任總統布希的父親，為美國第 41 位總統）和克林頓總統期間，國會對中國政策的批評所產生的「累積效果」(cumulative effect)，「強化了中美關係的停滯並降慢了向前的腳步」。²³就未來而言，美國國會有關中國議題的激烈爭辯一定會提升，尤其是在中國遵守世貿組織規則的缺點上（如保護智慧財產權）已經引起國會議員們相當程度的注意。而中美雙方貿易赤字的擴大、美國國內製造業就業人口的下降、人民幣的持續貶值（不升值）、以及中美之間對台灣的態度，這些都一定會在美國國會中引發激烈的爭辯。因而，把中國視為修正型國家的議員們在辯論時一定不會缺席。

²¹ Lubman, *op. cit.*, pp. 549-553.

²² Lubman, *op. cit.*, p. 556.

²³ Robert G. Sutter, "The US Congress: personal, partisan, political", in Ramon H. Myers, Michel C. Oksenberg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Making China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Bush and Clinton Administra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p. 108.

肆、中國在美國媒體中的形象

美國媒體在影響民眾的態度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有關外國或外交事宜。因為美國民眾（其他國家亦然）比較關心的仍是民生及國內議題，所以對外國的了解和態度就往往仰賴媒體的報導。所以，里斯（Alexander Liss）以內容分析法，研究從 2000 年到 2002 年美國 4 大名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以及《華爾街日報》）對中國的報導與態度，試圖了解中國在美國平面媒體中的形象。²⁴

就正面形象而言，4 大報對中國正面的報導在數量上顯然偏低，抵不過大量的負面說法（把中國描繪成一個侵略、殘暴和危險的地區）。大體上，正面報導可以區分為四類：（1）「中國市場」的經濟希望（promise）；（2）中國政府（政治）和經濟的改革；（3）外交合作；以及（4）文化的轉變。²⁵

相對地，美國四大報對中國負面的報導不斷重複在 6 大主題上：（1）與美國的敵對；（2）與台灣不可避免的衝突（統一台灣）；（3）國內法律和秩序的崩潰；（4）人權的迫害、壓制的政治體系；（5）普遍（蔓延）的社會不安；以及（6）政治體系內的腐敗。就數量及篇幅而言，這些報導或文章都壓倒性地超過對中國持正面形象的論述。以下就以上 6 項主題分別概述。

就中國與美國敵對／迫近的衝突而言，《紐約時報》一篇 2002 年 3 月的報導描述中國對美國核武政策（美國宣稱這是主權國家的權力）的反應是「典型的憤怒抗議」。而在一個月前的另一篇報導提及，中國拒絕讓日本救援一艘沉入中國經濟區的船隻，並把中國描繪成中國侵略性的試圖追過日本以成為亞洲的強權。而 2001 年 4 月美國 EP-3 偵察機與中國軍機相撞而迫降海南島事件，《紐約時報》開始一系列的報導，而主題則是「與中國相撞（衝突）」（Collision with China）。一篇 2000 年 10 月的文章提到，中國不僅願意而且渴望使用武力統一台灣，並對抗美國在亞洲的霸權。《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把焦點放在

²⁴ Alexander Liss, "Images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Print Media: a survey from 2000 to 2002,"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35 (2003), pp. 299-318.

²⁵ 有關四大報正面報導的詳細內容分析，請參考 Liss, *op. cit.*, pp. 310-317.

中國國防支出的增加上，卻忽視中國比日本與南韓都要少的事實。而 2001 年 10 月的文章則把中國說成是亞洲不穩定的影響力；同年 7 月的一篇文章則認為，上海五國（Shanghai Five, 包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及塔吉克）的目的是分裂美國和其聯盟的關係，並援助美國在中亞的敵人，如伊朗。《洛杉磯時報》對中國的態度則比較持平。該報 2002 年 4 月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國已逐漸發展出能力來擾亂亞洲現狀，但也嘗試和平地整合到亞洲體系。《華爾街日報》則是四大報中最沒有興趣把中國描述成興起的威脅的報紙。而其最主要的焦點則是放在中國的經濟希望上。²⁶

就中國與台灣的衝突而言，1995 和 1996 年台海危機期間，《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均嚴厲地批判中國，並將之描繪成具侵略性和危險性。在 2000 年台灣將舉行總統大選之前，《紐約時報》指出中共人民解放軍指揮官保證將發動「血腥之戰」以防止台灣宣佈獨立。其他報導的重心則包括軍事演習、北京具有敵意的官方聲明、威脅台灣事實主權、中國增加威脅台灣能力的慾望、中國憤怒減少其能力的發展（如軍售台灣和飛彈防衛系統）。2001 年 7 月的一篇報導指出，美國公民因被指控為台灣從事間諜活動而被扣留的苦境。《華盛頓郵報》2000 年 3 月的文章也指出，中國對台灣偏台獨的對應政策（對亞洲安全）產生嚴重的威脅；另外一篇同年 9 月的文章提到，中國試圖購買武器和軍事硬體以威脅美國在台灣海峽的軍力。《洛杉磯時報》雖然注意到中國具敵意的言論和威脅，但也觀察到北京政府對台態度靈活地轉變，因為他們知道對台威脅失敗並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感。同時，該報也深度分析兩岸關係，一方面台灣議題對中國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對台軟弱立場會給中共當局帶來的問題和困擾。而《華爾街日報》對台灣問題則持一貫立場：經濟整合會縮短政治差距。例如，金融方面：2002 年 3 月的一篇報導提到台灣的銀行在上海開設分行；能源方面：2001 年 12 月的文章則提到雙方可以在台灣海峽開採石油和天然氣；以及台灣一個速食連鎖店在大陸設分店等。

27

²⁶ Liss, *op. cit.*, 301-302.

²⁷ Liss, *op. cit.*, 303-304.

就中國法律和秩序崩潰方面，《紐約時報》顯示中國的印象是，日漸增加的犯罪和衰退的社會服務網絡已經使中國分崩離析。尤其，該報特別報導愛滋病的擴散和社會秩序遭受的傷害。而且，中國政府採用歐威爾的方式（Orwellian）²⁸來控制人民，並用史達林的方式不在乎人民的生命和安全。2002年1月的一篇報導指出，中國的道路安全差、下水道蓋遭竊，交通事件常致命。另一篇2001年12月的文章敘述中國政府掃盪犯罪的無力：幾個月內上百位警察在執行勤務時喪命。而對外國人加害的例子也在2000年4月的報導中與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相連結。《華盛頓郵報》於2000年12月報導一個購物中心大火造成307人喪命於火窟，究其原因則是官員腐敗、無能力、和刻意疏忽。而2001年3月的報導則抨擊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其造成的副作用是像傳染病似地流行綁架。而同月份的另一篇報導則是，心存不滿的國營企業解雇工人訴諸恐怖手段以報復政府剝奪他們的工作。

《洛杉磯時報》對中國內部不安的情形，不像報導中國國際行為時那麼平衡，態度相對嚴厲。例如，如同《紐約時報》一樣，該報批評中國的交通系統和基礎架構危險和落後。一篇2000年8月文章詳細報導盜版的錄影帶和電影非常普遍、到處可見。而2002年3月的文章論及中國鄉村經濟時，岌岌可危的工業小工廠不僅對其員工並對附近社區產生很大的危險，例如爆竹工廠爆炸，傷亡慘重。另外，2000年9月的報導，為配合水壩營建計畫，農民被迫遷徙，落得貧窮不說，甚而挺而走險犯罪。至於《華爾街日報》不像前面三份報紙一樣，不是只專重負面的報導。例如，2002年1月的一篇專文指出中國醫藥系統的落伍和僵硬，但該篇文章也討論改革將逐漸地轉變這個系統。另一篇2000年6月的文章報導，中國犯罪情況嚴重，但美國願意提供軍事援助幫中國盡力抓捕毒品走私，因而中美共同打擊犯罪的合作也與日俱增。²⁹

就人權迫害和壓制性政治體系而言，《紐約時報》2002年2月的一篇報導中國政府迫害「法輪功」宗教團體，其中巨細靡遺地描述法輪功成員如何遭到

²⁸ 在喬治·歐威爾的名著小說《一九八四》中，政府（即老大哥）無所不在地控制人民一切的行動。

²⁹ Liss, *op. cit.*, 304-306.

逮捕、拷打、驅逐的嚴苛對待。同月的另一篇專文則提及中國政府將政治犯監禁在精神病院中。2001年11月的文章強調，中國政府舉辦虛假不實的選舉，只不過是進行橡皮圖章式立法過程，而貫徹其不可動搖的統治。《華盛頓郵報》不但報導中國政府有迫害「法輪功」成員和政治異議人士的記錄，而且在過程中破壞人民的財產和生活。執法的中國警察在防止犯罪的手段上也非常粗暴：由於極度腐敗和沒效率，對於許多微小的罪行卻施加處分和重罰就可看出他們的無能。至於中國政府在徵稅的手段上也是極其粗魯。《洛杉磯時報》則報導布希總統於2002年2月訪問中國時，對於他在旅途中所發表的演說，中國政府實施嚴格的檢查（ *censorship* ）。2001年12月有一篇報導，中共想要實施戶口登記允許制度，但這種作法沒有受到審查。³⁰另外，報導提及，同性戀在中共政權下遭到處罰和處置。相對地，《華爾街日報》對這方面的報導很少。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該報報導，在處理日漸惡化的愛滋病上，中國政府否認此病帶來的嚴重性，並且對於那些感染者則未予以治療。

就社會不安而言，因為中國走向市場經濟，打破了實行多年的「鐵飯碗」政策，許多人不能適應，所以《紐約時報》報導，中國一般民眾在許多議題上準備與政府對抗。國營事業大量被解雇的員工可以說是不滿的主要來源，這是2002年3月某篇報導的內容。一篇出現在2000年8月的文章裡說道，國營企業的外籍主管遭到過去雇員的綁架。其他報導造成社會紛亂的主題則包括：嚴重工業污染引起健康問題、準備將處決的罪犯身體器官移植引發民眾憤怒。《華盛頓郵報》也不遺餘力地報導類似事件。例如，2000年7月報導，民眾抗議浪潮日增，並非因為工廠的解雇，而是因為基本服務（如飲水和健康照顧）的提供崩潰。新疆省分離份子從事的暴力行動，報導透露，被中國政府譴責為受到宗教極端份子賓拉登的影響。有關西藏問題的報導，中國政府被刻畫為進行系統性的殘暴和壓制政策，而且過去50年沒有任何改變。到澳門和香港與親人或配偶居住的大陸人士則被中國政府以殘酷的方式隔離並遣返大陸，根據報導，中國這種作為引起人民的憤憤不平。另外，社會不安的來源，也有報導指

³⁰ 附帶說明的是，美國沒有戶政，自然對於戶口制度感到困惑。

出，仍是勞工，但這次不是因企業重整或縮編而被解雇的人員，而是那些在危險性產業（如煤礦）工作的員工，因為他們處在極度危險的環境中（不符安全標準）工作。同樣地，《華爾街日報》也指出中國社會結構面臨緊張與民眾不滿的情況。例如，2001年12月麥當勞店發生一連串爆炸事件，但報導指出，放置炸彈者的動機（反美國主義或追求新疆回教的自主？）無從得知。有些報導則討論經濟落後區域裡勞工的暴動，以及民意反彈政治體系的不透明性。³¹

中國人的「關係」概念（可指為「聯繫」〔connections〕）很受到美國媒體的重視，因為可以藉此了解個人之間的關係。如果把「關係」用來檢驗政府，那麼這個概念在某種程度上就被誇大為中國政府中普遍出現了個人（徇私）偏袒主義（personal favoritism）和腐化情形。所以，一旦講到政府而用「關係」來形容，那就表示政府中充滿了自私自利、不在乎為大眾服務的精英份子。而「關係系統」則被描繪成政府、商業和工業幾乎每個部門中所製造出來腐敗及不透明的實際運作及作為。

就腐敗而言，《紐約時報》在2002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詳細報導中國大型國營銀行廣泛流行的腐敗。另外的報導則是，政府中說謊的官員吹噓其部門或計畫在統計數字上的良好表現，為的是要獲得其上級長官的青睞與提拔。其實，這種情景其來有自，一篇報導提到，遠在「大躍進」時代，國家健保體制內的醫生們對於那些會贈予優渥報酬的病人提供最便利的醫療照顧。《華盛頓郵報》對腐敗的關心則是不遺餘力，熱心的程度要勝過其他3大報的努力（報導的數量最多）。例如，2001年3月的一篇文章報導，中國司法體系已遭到犯罪集團和不肖（操守受到質疑）官員的滲透入侵。至於經濟市場方面，不斷有醒目的標題報導，內線交易和有權力商人的「關係」已使剛萌芽的股票市場和金融市場遭到蹂躪和破壞。2001年9月的一篇文章對此做了分析。另外，中共政黨高層腐化的情形亦很嚴重，根據2002年1月某篇新聞報導，黨上層領導利用個人權力多過實際判斷，往往偏袒、起用親戚（nepotism）、以及普遍的道德敗壞（moral turpitude）。

³¹ Liss, *op. cit.*, 304-306.

《洛杉磯時報》雖然在報導腐敗上不如《華盛頓郵報》那麼努力，但也不落人後。2000年5月就刊登一則報導，三峽水壩計畫的實施已經顯現出日本風格的豬肉桶政治（Japan-style port barrel politics）³²，並影響污染了中國公共營造業。另外，《洛杉磯時報》也注意到，中國政府推行反貪污運動以及許多高階官員因而下台。2001年12月的一篇報導提到，由上海市市長的離職就可顯示出中國政治體系裡進昇的特質：不是依據績效，而是根據對黨的忠誠度以及所有的重要「關係」。由於《華爾街日報》為商業性報紙，所以其焦點都擺在腐敗如何影響干涉外國投資和企業投資計畫上，尤其國營銀行的問題最受注意。另外，《華爾街日報》在以下兩方面的報導最多：（1）中國剛開始發展的相互基金和金融市場在規定上具有尚未成形（捉摸不定）的性質（amorphous nature）；（2）在中國石油和天然氣產業的發展上，外國公司想要與中國國營企業一較長短時，普遍遭遇「平坦球場」（a level playing field）³³難以取得的困難。雖然《華爾街日報》在這兩則的報導上仍持樂觀的態度，但不可否認地，腐敗情形仍然存在。至於《華爾街日報》的態度則是：只有減少腐敗現象，才能獲得更多的外國投資。³⁴

總之，美國4大報在處理有關中國的新聞上，就數量而言，負面報導較多，使人產生的惡劣形象是：中國是個政治壓迫、罪惡和蘇聯式虐待人民的地方。而中國政府則被描繪成「教導人民、加強軍事訓練，最終是要達到擴張在亞洲地區地緣政治影響力的目的，並在過程中與美國正面衝突（head-to-head）」。
藉著醜化中國為「挑戰美國的海外權力、否定美國生活方式的原則和價值」，這些報導已逐漸說服它們的讀者把中國看作是種威脅。如果美國人民開始把中國當作是敵人時，那麼就會因此影響美國政府的行為。但「這是一種危險的錯誤，會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的話，那麼就會嚴重傷害中美之間的雙邊關係。³⁵

³² 所謂豬肉桶政治，指的是政府在分配利益和資源時的偏袒主義（favoritism）。

³³ 此處比喻「公平競爭」。

³⁴ Liss, *op. cit.*, 309-310.

³⁵ Liss, *op. cit.*, 317-318.

伍、中國威脅論

布希總統在第一任上任之初，延續萊斯的說法，宣稱中國是「戰略的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根據美國 CNN 電視新聞網的報導，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則在 2001 年 5 月初的共黨高層會議上以 12 個字批評布希：「邏輯不通、毫無章法、極不明智」(logically unsound; confused and unprincipled; unwise to the extreme)。³⁶不過，中國崛起對美國產生嚴重的威脅，在認知上，已經存在相當一段時間。這可回溯到 13 年前，1992 年 9 月，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拉森上將於夏威夷發表演說，就亞洲安全問題提出「中國威脅論」，認為南海為亞洲下一個戰爭衝突點。這是「中國威脅」的濫觴。³⁷此後，某些政策決定者和學術界人士熱烈討論此議題。許多書籍和保守性刊物也都探討中國對美國的威脅。基本上，「中國威脅」議題以不同的形式表達，但可分成三個層面：意識形態、經濟以及軍事。以下針對這些層面分別探討。

首先，奈伊 (Joseph Nye) 認為，說「中國崛起」(China's rise) 是有點「辨認錯誤」(misidentification)，因為中國「不只是回到強權而已」(more of a return to power)。³⁸從 500 年到 1500 年的 100 年間，中國主宰了亞太區域，而今則試圖恢復其區域大國的地位。反中國人士強調，中國並非現狀型國家，而且有一些區域安全的議題中國希望以有利的方式解決，以便恢復其光榮過去的領導者地位。重新統一台灣並控制南海，對中國作為領導者而言，特別重要。因而，中國戰略的目標就是主宰亞洲，就像歷史上每個中國朝代權力達到頂峰時的狀況一樣。³⁹

由於中國正在崛起之中以及其試圖取代美國成為區域中先前優越地位，所以極右派人士視中國具有意識形態的威脅。隨著蘇聯的瓦解，中國被視為共產主義所剩下來的新意識形態領導者，因而在東西敵對的本質下，中國成為美國

³⁶ www.cnn.com, 24 May 2001.

³⁷ 文馨，〈對「中國威脅論」之研析〉，《中共研究》，第 29 卷第 8 期（1995 年 8 月），頁 67。

³⁸ Joseph S. Nye, "China's Re-Emergence and th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Survival*, Vol. 39, No. 4 (1997-98), p. 66.

³⁹ Ross H. Munro, "Taiwan: What China Really Wants?" *National Review*, Vol. 51, No. 19 (11 October 1999), p. 46.

意識形態的競爭者。不過，中國的共產主義與蘇聯的共產主義不同。冷戰已經結束，而中國的共產主義又和資本主義的界限非常模糊，因為其已擁抱了市場經濟體系。透過經濟自由化，中國的共產主義近年來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繁榮和穩定。然而，中國的共產主義不太容易輸出到其他鄰國。⁴⁰倒是民族主義取代了共產主義，成為團結及正當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意識形態。許多反中國的人士宣稱，中國民族主義的擴張，對亞洲而言，「是特別有害的不穩定力量，因為它既是民粹也是軍事導向的民族主義」。⁴¹因此，中國威脅論認為，民族主義而非共產主義將被用來支持區域中的領土擴張。

而讓許多反中國人士擔憂的是，這種民族主義的再度興起具有反美國的本質：「反美國主義已經變為與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有關了」。⁴²基於共產主義不可能成為 21 世紀的意識形態，中國領導者正在建構愛國主義並把美國的存在當作「勁敵」（Great Enemy）以便保留其正當性：利用中國人民對外國人的恐懼症（xenophobia），而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對付美國。⁴³同時，中國人鄙視外國干涉其國內事務，也厭惡外國影響力介入，並抨擊美國的民主意識形態，因為中國人覺得這是「精神污染」。1996 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出版，就是要中國人民抵制美國商品並起來對抗美國的「強欺弱」（bullying）。⁴⁴主張中國威脅論的人士指出，1999 年 5 月美國空軍誤炸中國在貝爾格勒的大使館後，上萬個中國青年走上街頭抗議示威（自天安門事件後最大的抗議活動），再加上 2001 年 5 月美國海軍偵察機 EP-3 擦撞中國空軍飛機而迫降海南島事件，更激化了中國強烈的民族主義。

支持中國威脅論的學者們也提出，中國把美國視為一種威脅，並視美國是個霸權國家試圖圍堵中國。他們主張，中國的世界地緣政治觀點以及對美國在

⁴⁰ John O'Sullivan, "A Yellow Peril? No: Excesses of the New Anti-China Lobby," *National Review*, Vol. 52, No. 8 (1 May 2000), pp. 28-30.

⁴¹ David Aikman, "Taiwanese Takeout: The Coming U.S.-China Showdown," *The American Spectator*, Vol. 29, No. 4 (April 1996), p. 20.

⁴²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p. 5.

⁴³ Ibid.

⁴⁴ James Miles, "Chinese Nationalism, US Policy and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Vol. 42, No. 4 (2000-01), pp. 51-73.

其後院(日本、台灣)發揮影響力的不滿,自然會對美國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⁴⁵另外,中國的共產主義基本性質不但威脅了美國也威脅到其本身共產主義的生存。當中國向西方開放時,中國領導者發現他們處於正當性危機,不願意他們擁有的權力和共產主義均向西方讓步或屈服。美國一些右派人士相信,中國與日俱增的內部混亂將使中國領導階層更武斷並冒險與美國一戰,以保存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統治。⁴⁶同時,反中國人士認為,中國共產主義會威脅美國是因為其違反了廣大中國人民的人權。這種對人權的違背等於是挑戰了西方世界(包括美國)對人權尊重的原則:「共產主義不僅企圖改變外在的政治條件,而且也試圖改造人的內在本質—因而其強調不但要灌輸大眾的集體思想,並且要憎恨任何對人性持相反的觀點。共產主義這種特性可以解釋其最危險的特徵:未能賦予人類生活任何價值」。⁴⁷所以,中國政府對天安門廣場群眾的鎮壓以及對法輪功團體的迫害,對美國右派人士而言,正好證明了中國的極權統治甚而威脅到整個世界。

其次,就經濟威脅而言,中國自 1990 年代成為世界舞台上的經濟巨人時,許多反中國的人士擔憂這對美國的影響:是否中國利用其經濟力量欺負(bully)鄰國並挑戰美國?中國經濟的日益成長和強大,讓美國憂心的是與中國貿易赤字的日漸擴大。過去,美國與日本的貿易一直維持著高額的赤字比例,但 1996 年時,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首度超過日本(也就是,美國對外貿易赤字最大的國家已是中國,不再是日本),而且這種趨勢沒有減緩的跡象。事實上,1995 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要比從美國的進口多出 4 倍。右派人士認為,中國對美國的貿易出超是中國直接把目標放在美國產業上的結果:「中國策略的作用就是透過補助和關稅的手段以減低(undersell)美國的競爭力」。⁴⁸因此,赤字可能會傷害美國經濟並可能成為未來中美關係爭議的主要來源。

右派人士認為,中國採取出口導向的模式出口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以傾銷

⁴⁵ Nicholas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1 (November/December 1993), p. 73.

⁴⁶ Edward Timperlake and William Triplett II, *Red Dragon Rising*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1999), p. 40.

⁴⁷ 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0), p. 5.

⁴⁸ Bernstein and Munro, *op. cit.*, p. 135.

的方式進佔美國市場，但以自由市場為經濟體系的美國則幾乎無法抵擋，因而中國的輸出直接對美國經濟造成威脅。一方面，人民幣貶值，大陸產品價格低廉，在外國市場具有強勁的競爭力，另一方面，中國實施進口替代政策，迫使外國在大陸投資的公司必須採用大陸的零件。例如，中國在沒有要求外商汽車公司採用大陸生產的零件之前，美國汽車業有 5 億 210 萬美元的盈餘，但政策實施 1 年之後，美國汽車業則虧損 4 億 540 萬美元，這等於貿易關係逆轉近 10 億美元。⁴⁹

中國的經濟成長對自然環境也造成威脅。因為工業化，能源的需求也相對大增。例如，中國 2004 年的經濟成長率達 9.5%；2003 至 2004 年間，中國平均一年消耗全球 31% 的煤，25% 的鋼，45% 的水泥，以及 8% 的石油（耗油量僅次於美國）。⁵⁰由於需油量增加，反中人士認為，中國勢必會在南海（因儲存大量石油能源）進行開採行動，必定會與周邊鄰國發生衝突與爭議。另外，中國也是未來最大的污染國，惡化全球暖化現象。據估計，至 2025 年時，中國製造出的二氧化碳是美國的 3 倍。當然，就人口平均而言，平均每個美國人的污染則是中國人平均的 9 倍。不過，反中人士強調，北京政府不情願限制廢氣排放或開支污染控制費用，足可證明中國經濟成長對其餘世界造成環境的威脅。⁵¹甚且，中國可以利用其經濟實力當作外交工具而威脅美國利益。例如，以保留契約的承諾或轉往其他市場作為威脅和外交工具，可以降低或減少美國對中國人權記錄的批評。另外，中國在美國克林頓時代就不斷聲稱，把最惠國待遇與中國人權聯繫在一起，會增加美國產業的成本。至於美國軍售台灣，中國暗示會造成經濟不良反應（*repercussions*）。⁵²

美國右派人士認為，中國經濟實力的壯大在與亞洲國家和美國關係上變得更獨斷獨行。「以目前的經濟成長率，中國的生產能力和總財富將很快超越其他亞太國家，而其日漸增長的相對能力會促成中國為興起的強權並對周遭事物

⁴⁹ Ibid., p. 140.

⁵⁰ 經濟部，《當前經濟情勢與政府政策》（台北：經濟部，2005 年 7 月 5 日），頁 10。

⁵¹ Emma V. Broomfield, "Perceptions of Danger: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35 (2003), p. 273.

⁵² June Teufel Dreyer, "U.S. Policy toward China: Judge China by its Deeds, not Its Words,"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6 April 2001).

執行更多的控制。身為弱國，中國依賴其鄰國的程度相當高，但成為大國時，中國將行動大膽，更傾向於以其意志施加於別國身上，而非與其諮商。⁵³此外，令美國右派人士擔憂的是，中國經濟策略的目標是獲得高科技以及雙重用途的科技，常常透過間諜活動來達成目的，因而在戰略上威脅到美國。中國要獲得西方技術的其中一個策略就是，要求外國公司在中國生產一定數量的零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很快提升其「學習曲線」，並藉著外國公司訓練中國工人時，「從做中學」。兩個例子可為明證，第一個是美國麥當諾—道格（McDonnell-Douglas）飛機公司與中國國營的上海航空工業公司達成協議，該公司的飛機零件要在中國工廠由中國工人組裝，這可說是「歷史上最大的技術轉移」；另一個例子則是美國波音（Boeing）公司允許其飛機尾端部分可在中國製造，這等於提供中國技術用來製造軍用飛機。⁵⁴根據美國眾議員卡克斯（Christopher Cox）1999年的報告，中國已被認為得到雙重使用的技術：「逐漸地，中國利用美國的資本市場，不但提供中央政府軍事和商業發展的資源，而且隱匿其前線公司（cloaking）獲得美國技術的企圖」。⁵⁵多年來中國情報單位一直不斷地利用座落在洛杉磯的中國領事館和掩護公司「中國旅遊公司」（China Travel Service）蒐集情報。「擁有現代固體燃料發射的多彈頭洲際飛彈（ICBMs），中國近期（near-term）（之所以）有潛在威脅美國的能力，可以說是其獲得美國技術，包括非法與合法，最直接的結果」。⁵⁶換句話說，中國經濟方面的間諜活動提供了很好的中國威脅論存在理由。

至於中國人民解放軍（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的經濟運作則是中國經濟威脅美國最強而有力的論點。中國國營企業「紅晶片」（red chips）已經滲透到美國市場之中，在美國西海岸設立公司並併購原先存在的公司，不但增加利潤而且便利技術轉移。例如，美國玩具商店中有許多玩具是由諾林扣（Norinco）公司製造，但這家公司同時也提供武器給 PLA。另外，美國聯邦

⁵³ Denny Roy, "The China Threat Issue," *Asian Survey*, Vol. 36, No. 8 (1996), pp. 761-762.

⁵⁴ Broomfield, *op. cit.*, p. 275.

⁵⁵ Michael Waller, "China Cashes in," *Insight Magazine* (24 December 1999).

⁵⁶ Richard D. Fisher and Baker Spring, "China's Nuclear and Missile Espionage Heightens the Need for Missile Defense,"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s* (2 July 1999).

調查局 (FBI) 查獲替美國幫派購買 AK-47 自動武器的走私集團，同時也獲悉其中兩家公司與 PLA 有關係。而中國威脅論人士更大的憂慮則是，美國市場的進入以及中國日漸成長的貿易順差，將會資助 PLA 的茁壯，並且準備未來與美國的衝突。據估計，PLA 在擁有大約 2 萬個公司中每年有 200 億美元的貿易總額，而其中 12 家公司則在美國經營。⁵⁷ 正因為中國經濟擴張伴隨著 PLA 主要公司在美國經營，許多美國人擔心中國與美國的貿易將實際助長了 PLA 的現代化。

再者，對美國官員和反中人士而言，中國崛起所導致最擔憂的層面就是，經濟和軍事現代化的國家可能在軍事上和戰略上對美國造成威脅。所以，就軍事威脅論而言，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廣泛計畫令美國右派人士憂心。據美國官方估計，PLA 從 1988 到 1995 年間預算成長了 140%。⁵⁸ 根據美國智庫蘭德 (RAND) 公司 1999 年的研究，中國預計於 2050 年時將完全軍隊現代化。⁵⁹ 當然，許多反中人士都同意，中國目前並未立即對美國有軍事上的威脅，但他們認為，未來 10 年或甚至 20 年 PLA 將實質上已現代化。

至於資訊戰的興起也讓反中人士擔憂：中國已經將焦點放在與美國高科技轉移上，並邀請如羅拉—休茲 (Loral-Hughes) 公司 (透過技術轉移) 幫助其發展電子武器 (electronic weapons)。資訊和電子戰是目前中國極力追求的目標，因為中國的傳統武器系統無法擊敗美國，而高科技資訊戰則能破壞美國基礎建設、截斷並干擾美國通訊及電腦網絡。所以，提姆柏雷克 (Edward Timperlake) 與崔普雷特 (William Triplett II) 提出警告：「美國經濟、政治和社會體系實質上不能免於中國資訊戰的攻擊……我們判斷，中國發動資訊戰，對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會造成未預警的國家安全威脅」。⁶⁰

⁵⁷ Broomfield, *op. cit.*, p.276.

⁵⁸ Karl W. Eikenberry, "Does China Threaten Asia-Pacific Regional Stability?" *Parameters*, Vol. 25, No. 1 (Spring 1995), p.5.

⁵⁹ Zalmay M. Khalilzad, Abram N. Shulsky, Daniel L. Byman, Roger Cliff, David T. Orletsky, David Shalapak and Ashley J.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Washington, DC: RAND, 1999), p. xii.

⁶⁰ Edward Timperlake and William C. Triplett II, *Year of the Rat: How Bill Clinton and Al Gore Compromised U.S. Security for Chinese Cash*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1998), pp. 64-167.

中國取得雙重用途的衛星也成為美國右派人士爭論的核心議題。中國發展空中發射載具，如「長征三號」(Long March 3)，已經幾乎擁有彈道飛彈相同的技術。而且提姆柏雷克與崔普雷特主張，不要支助「國防科學、技術和工業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for National Defense, COSTIND)的太空探索計畫是具有其重要的意義，因為他們害怕中國將轉換太空為軍事戰場。同時，衛星含有譯成密碼的技術(encryption technology)，PLA 可利用將通訊譯成密碼並發動資訊戰爭。由於美國軍隊使用武力並偵測外國軍事活動時，非常依賴以太空為基地的通訊設備，所以「擁有損壞或摧毀衛星的能力，讓中國有戰略武器對抗美國軍隊……而更嚴重的危險則是美國能力非常有限，不能在需要的時候更換太空軌道上的太空船」。⁶¹反中人士擔憂，中國未來將使用資訊戰，先發制人地對付美國；同時他們發現更令人驚惶的(disconcerting)是，中國目標可能不只是對付美國軍隊而已，而且也包括美國民眾。⁶²

另外，反中人士認為，實際而且立即的威脅是北京政府的武器繁衍和軍售給流氓國家。大部分的分析家都同意，這類的軍售潛在性造成國際秩序的不穩定，不過反中人士宣稱，北京政府是好戰式的軍售，並以這種間接的方式來對付美國。根據葛茲(Bill Gertz)看法，中國會提供巴基斯坦這種國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提供美國的敵人傳統性武器，是因為中國不關心人民的生活，這可從天安門屠殺事件中見端倪。⁶³所以，葛茲認為，「任何美國的敵人就是中國潛在的顧客」。⁶⁴也就是，中國支持美國的敵人，等於間接地威脅了美國的安全。《華盛頓郵報》1991年報導，中國幫助伊拉克在阿爾及利亞建造核子反應爐。另外，中國於1980年代把彈道飛彈及核能技術出口到巴基斯坦，並於1992年銷售M-11核子武器給巴基斯坦。中國這種作為不僅在華府引起警報聲響，而且身為簽約國明顯違反了核子非繁衍條約的規定。⁶⁵

⁶¹ Frank J. Gaffney, "Spaced Out," *The National Review*: Guest Comment (11 September 2000); Broomfield, *op. cit.*, p. 279.

⁶² Broomfield, *op. cit.*, p. 279.

⁶³ Gertz, *op. cit.*, p. xi.

⁶⁴ *Ibid.*, p. 108.

⁶⁵ Broomfield, *op. cit.*, p. 280.

也有人指控，中國軍售的對象包括那些贊助恐怖主義的國家，如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朗。美國情報局單位發現許多類似的軍售，而中國威脅的理論家警告，PLA 及其顧客國已經變得非常老練於掩藏其管道途徑，因而實際軍售的數量可能比美國政府所報告的數字要高出許多。例如，據報導中國幫助伊朗興建核能計畫以及學會了製造生化武器的能力；⁶⁶中國援助利比亞的方式則是軍售和製造化學武器的能力教導；⁶⁷1996年中國透過第三國家運送飛彈引導設備到敘利亞，因而限制了飛彈技術控制體制（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 MTCR）的功能發揮。⁶⁸

反中人士也擔心，中國對其鄰國展現軍事威脅的情形：侵略台灣和宣稱對南海保有主權並開採其天然能源是兩個最明顯的例子，不但造成東亞區域的不穩定並與鄰近國家出現爭議及對立。同時，中國軍事力量也對美國在亞洲區域的利益造成威脅。日本強大是美國維持區域安全和權力平衡的實質力量。但如果中國控制南海和軍事援助北韓將是日本的夢魘。⁶⁹

總之，中國威脅的論點來自於意識形態、經濟和軍事三個層面。這些論點固然有其真實存在，但是否言過其實而誇大中國的威脅？中國的動向為何？有任何徵兆中國已成為修正型或現狀型國家？是否其所作所為，如中國威脅論所斷言的，已經開始威脅並挑戰美國及亞洲的鄰國？這些問題都值得探討。以下就幾項指標衡量中國是否為修正型強權或現狀型國家。

陸、對中國的評估

上述第二節討論學者們對修正型國家與現狀型國家這兩個概念意見不同。但我們至少可以從某國是否遵守國際間「遊戲規則」衡量國家是否為修正型或現狀型國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詹斯頓（Alstair Iain Johnston）借用吉爾平操作化遊戲規則的三個要素來衡量中國。

⁶⁶ Jeffrey Smith, *Washington Post* (8 March 1996); Broomfield, *op. cit.*, p. 280.

⁶⁷ Timperlake and Triplett, *Red Dragon Rising*, p. 111.

⁶⁸ Bill Gertz, *The Washington Post* (24 July 1996); Broomfield, *op. cit.*, p. 280.

⁶⁹ Broomfield, *op. cit.*, p. 281.

就遵守遊戲規則而言，修正型國家（1）參與國際制度（指的是規範國際社會成員活動的制度）的比率低。換句話說，非現狀型國家（雖然可以，但是）實際並未牽涉（involved）許多國際制度，因為國際制度可以幫助建立與調和國際社會成員間的關係；（2）也許參與國際制度，但並未接受該社群的規範（norms）。也就是，非現狀型國家一旦加入成為會員國時，就會打破該組織的規則與規範；（3）也許參與國際制度並暫時遵守該規則和規範，但只要有機會，就會企圖改變這些規則與規範，徹底改頭換面原來成立的宗旨。⁷⁰以下針對這三個指標分別探討中國在國際制度的遊戲規則上是否要改變現狀。

第一，就參與國際組織的多寡而言，中國成為國際制度和組織的成員已經穩定性的增加，而且在後毛澤東時期更是快速。從 196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間，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數量上已經從幾乎孤立的情況成長到大約為主要工業國家 80% 的地步，同時也大概是世界各國平均的 160%。此外，相對於任何一年有資格簽署的多邊條約中，中國簽署條約的百分比也日漸增多。這些數字顯示中國領導人願意參加國際制度。例如，在 1970 年代大部分時間裡，中國在所有可以簽署的武器限制條約中只不過簽定了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條約。到了 1990 年代中期，數量已經攀升到 80%。⁷¹

第二，就違反國際組織的規則與規範而言，涉及的問題較為複雜，無法以簡單的數字就可以回答。通常，國際制度中有關的規則與規範包含：主權、自由貿易、核武非繁衍及武器控制、民族自決以及人權等五個部分。以下將分別探討。就主權而言，大部分國際制度的重要特徵就是由主權國家所組成。雖然主權在意義上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跟著改變，但今天中國可以說是其中之一最堅決支持這個傳統、絕對性的概念（主權）。而且，中國全盤且保守地捍衛其主權，不容許任何以其他的概念（如人權、國內治理、人道性干涉等）作為理由來挑戰與侵犯中國的主權。

⁷⁰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 11.

⁷¹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in Samuel S.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p. 67;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pp. 12-13.

就自由貿易而言，從 1970 年代後期起，中國一般已經支持全球自由貿易的規範。例如，中國平均的關稅率已經從 1992 年超過 40% 下降到 1997 年不到 20%。而且，中國進入世貿組織後，2004 年到 2005 年間，工業產品的平均關稅是 9.4% 的稅率，而農業產品則為 14.5% 的稅率。當然，中國會有一些違反規則的行為，但卻很難跳脫世貿組織的監督。雖然中國利用世貿組織中規則的漏洞來保護其政治上重要的經濟團體，但美國又何嘗不是如此。例如，美國武斷地使用有關反傾銷的規則以保護其政治上重要的經濟團體。許多專家認為，中國遵從世貿組織規定的主要問題，與其說是中央政府刻意不顧對世貿組織的承諾，不如說是難以控制的省及地方經濟利益不服從的結果。不過，美國國務院正式的結論是，中國採用「誠實的方式」(a good faith approach) 來配合進入世貿組織的要求。⁷²事實上，中國逐漸擁抱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日益接受自由貿易、開放資本流動和透明性等規範，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想透過經濟發展以強化其統治正當性，因為中國領導者明白，經濟成長，進而正當性，來自於與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的整合，而非與其分離或試圖基本上改變這些制度。⁷³

就非繁衍和武器控制而言，評論中國的表現可以依據以下五種行為。(1) 違反正式多邊條約；(2) 違反單邊或雙邊的政策宣告，但在國際法下並不違法（如中國於 2000 年 11 月承諾，在飛彈技術控制體制〈MTCR〉規定下，不幫助其他國家發展飛彈）；(3) 並未違反政策宣言或國際法（核能技術轉移到原子能總署指定的檢測地點）；(4) 未簽訂條約（即在條約之外）但與美國利益相同（如反對渥太華地雷條約，因為其要求全面禁止使用、發展和移放對人埋設的地雷）；(5) 與許多國家站在同一邊，反對孤立的美國（如中國反對布希總統於 2001 年 12 月的宣布，其將撤消 1972 年的反彈道飛彈條約）。

上述 (5) 不能算是違反國際體制。(2) 及 (3) 就不是那麼明顯地違反「遊

⁷² John M. Huntsman Jr., U.S. deputy trade representative, testimony before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June 6, 2002, <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uschina/huntsman.htm>.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p. 15.

⁷³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pp. 16-17.

戲規則」。而（1）及（4）則最清楚不過地已經向國際規範挑戰。就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繁衍而言，中國並非唯一的國家轉移技術給美國敵對的國家。前述中國轉移核子武器給巴基斯坦，並於 1992 年再轉售 M-11 彈道飛彈零件給巴基斯坦，之後中國便同意遵守 1987 年的 MTCR 並於 1996 年簽署全面性禁止核子試爆條約（*the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CTBT*）。美國政府則正式宣布中國這種表現已經大有改善：比過去較不積極軍售和繁衍核子武器，但仍然未完全遵守 MTCR。一般而言，中國已經簽署一些潛在性限制武器控制協定。CTBT 是個明顯的例子，因為此條約限制了中國現代化其核子武器彈頭設計的能力。而且，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證據中國已經違反此條約。⁷⁴雖然中國仍然是主要武器輸出國，但於 1990 年代失去了武器市場的優勢，因為許多國家已經轉向前蘇聯、美國或西歐等國的軍售商，購買更便宜和性能更好的武器。

就民族自決而言，中國常常被譴責違反這個規範，例如，對待西藏人、新疆維吾爾人或台灣人。不過，有兩點需要澄清。首先，所謂民族自決的國際規範並不承認，任何社會、政治或種族團體有絕對權利要求主權獨立。基本上，任何國家會毫無條件地對民族自決背書，是令人質疑的。聯合國在 1960 年代有關「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和「民族解放」（*national liberation*）的文件中，態度非常明確：聯合國承認受壓迫民族有權利決定他們自己的未來（必要時建立獨立主權的國家），但聯合國同時也試圖保護那些新興、剛獨立、解除殖民的國家，免於下一步的解體。換句話說，自決的權利通常只擴及到那些受到外國統治（如殖民主義）的人，以及那些幾乎沒有機會能有意義地參與他們自己本身治理的人身上。大部分國家的憲法並不承認其國內少數團體有自主的權利和脫離的權利。一般而言，有關民族自決的國際規範在設計上是保護現存的主權國家。

其次，美國實務的外交政策對民族自決的態度模稜兩可、標準不一。譬如，美國不支持加拿大魁北克的獨立（雖然大多數的魁北克人贊成），但於 1990

⁷⁴ *Ibid.*, pp. 17-18.

年代又指明支持某種形式的獨立，如以公民複決（referendum）方式進行。另一方面，美國雖然於 1999 年干預塞爾維亞（Serbia），反對其壓迫科索沃（Kosovo）人民，但又不支持科索沃獨立。當初，美國並不贊成南斯拉夫分裂。當然，美國也不會支持美國印第安人、俄羅斯的車臣、甚至西藏人有民族自決的權利並建立主權國家。

就人權而言，民主國家和爲人權伸張的非政府組織常常抨擊中國迫害人權。但如果從國際社會中多數國家的立場檢視，那麼中國並不處於完全挨打的地位。例如，面對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其爲檢驗人權是否落實的一個重要國際論壇），中國總能聯合並聚集足夠的國家投票支持中國，並於 1992 年到 2001 年期間，每次均擊敗譴責中國違背人權的決議案。由於投票判決勝負的標準採簡單相對多數制（簡單多數制，plurality），中國總能獲得多數國家的支持，可以算是屬於「國際社會」及「人權體制」內的成員。然而，如果以國際體系內多數國家其國內的人權實踐觀察，那麼中國就不屬於「國際社會」內，但僅僅差一點而已（barely）。國際體系內，只有稍微過半數的國家爲民主國家，但相當多但仍屬少數的國家則實施專制和獨裁統治。⁷⁵

就國際人權體制的內容而言，根據 1993 年維也納會議宣言，「國際社會」，一方面，承認個人的政治和公民自由，但另一方面，也承認集體的社會和經濟權利（包括發展的權利）。因此，當美國以政治和公民自由檢驗中國行爲時，中國卻強調集體的社會和經濟權利作爲回應，這就出現了各說各話的局面，而且兩方所使用的標準都只能算是一半，並不完全代表維也納宣言。不錯，中國當局，不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不時地違背，不管是根據中國自己的憲法或中國所簽署的人權協定，所保證的政治和合法權利。然而，中國在保護中國人民的社會和經濟權利上是不是也同樣重要？經濟發展導致數以百萬計的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但是否這可成爲社會經濟權利的提升，則不是那麼明顯。這牽涉到意識形態的問題。主要中國城市的社會經濟進步，是否可以算作整個中國人民社會經濟權利的提升？正在逐漸成長的所得差距（收入不平等）、環境惡化、

⁷⁵ Ibid., p. 20.

以及缺乏適當的教育、福利和健保制度（主要在鄉村地區），是否違反了社會和經濟的權利？這要看是從國家福利體系的角度或是從市場經濟的角度分析，因而中國在保護其人民的經濟和社會權利上，可能惡化，也可能改善。⁷⁶總之，就中國是否遵守國際規範這個問題而言，中國比過去似乎愈來愈與現存的國際社會一致。

第三，就企圖改變國際組織的「遊戲規則」而言，檢驗中國實際的作為可從其參與經濟和安全兩方面的國際制度上探討。首先，在國際經濟制度中，中國很少建議新的規則。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所參加的國際組織在中國未加入之前，規則已經建立並行之有年，並且也是因為，這些規則常常滿足中國的經濟利益（如從世界銀行獲得資金）。同時，大部分學術界的觀察都對中國在配合現行實施原則上持肯定的態度。例如，中國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中都有不錯的表現，都盡量配合這兩個組織的報告要求，而且組織決策的方式也沒有任何戲劇性的改變而偏袒中國。在世貿組織中，中國一般都接受整個決策的程序和結構，而且在組織內對於領導者角色的扮演非常小心翼翼。

其次，在國際安全制度中，情況則不是那麼明顯，這是因為中國參與了一些重要制度的建構。例如，就 CTBT 而言，如果在協商過程裡中國提出的建議被採納，那麼該條約就不會那麼具有強制性，承諾國不會受到更嚴格的監督，而且簽署國也被允許進行「和平的核子爆破」（但這也嚴重地腐蝕了「核子武器禁止試爆」的證明能力）。另一方面，如果中國在其他方面的談判立場也獲得支持的話，那麼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就必須遵守「不最先使用」（no-first-use）的誓言。如果可以得到確證（例如，飛彈彈頭和飛彈發射器之間相距好幾英哩，使得準備發射飛彈時容易被偵察到，這稱之為「一切條件備妥後才生效的彈頭」，escrowing warheads），那麼多邊性不最先使用的誓言（a multilateral no-first-use pledge）可以減少「依靠核子武器確保安全」的誘因。不過，中國設計的 CTBT 在實地監督的規定上比較薄弱，所以需要昂貴和範圍廣的衛星監督能力。目前，監督體系的運作只是在事情發生後才確證是否違

⁷⁶ Ibid., pp. 20-22.

反規定。其他的國家，如加拿大，雖然支持中國 CTBT 國際衛星監督的原則，但卻反對所需要的花費，因為分擔的成本太高。⁷⁷

事實上，中國想要改變現存的國際經濟和安全制度的規則，並不是那麼容易。大多數的制度都有「原則中的原則」(rules about rules)。也就是，組織或制度中的規範、意識形態和成立的目的要更動，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才能完成。而不令人感到驚訝的是，許多制度的規則在修改的程序上非常保守，目的是防止制度的目的輕易地被改變。另外，制度本身有其行政組織和專職人員，這些人員對於組織的利益和任務都有強烈的意識，並且他們也幫助制度本身發展出制定決策的規則和規範，避免他們的權力和任務遭到輕易的腐蝕和稀釋。⁷⁸例如，世貿組織要更改條文規定需要超多數 (supermajorities) 或共識，所以任何試圖修改組織章程的國家都必須費盡一切努力來爭取絕對多數的支持。所以，就企圖改變國際組織的遊戲規則而言，不但工程耗大，而且效果不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又何苦來哉。甚且，從聯合國投票的記錄來看，中國與其他維持現狀的國家意見分歧的情況並不多。當然，美國與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利益上有衝突，但這與中國想改變遊戲規則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而相提並論。

總之，就國際組織的遊戲規則而言，目前看不出任何跡象中國想要改變現狀（也就是，遊戲規則的內容）。無論就參與國際組織的數目上、遵行參與組織的規範上、以及試圖改變國際組織運行原則上，中國的表現大致上仍不能稱之為有修正型國家的傾向。與上述美國國會、平面媒體、以及反中和右派人士的負面觀點和論述相較，目前中國似乎並沒有那麼強烈的慾望唯我獨尊，迫不急待地特立獨行、我行我素，並挑戰現行的國際制度。那麼，除了在國際組織上我們對中國的行為有所了解後，下一步就是要清楚中國實際在亞洲的作為，以便辨別其是否有修正型強權的意圖。

⁷⁷ Ibid., pp. 23-24.

⁷⁸ Ibid., p. 24.

柒、中國與亞洲的接觸

1950年代到1970年代亞洲國家對中國抱持著負面的形象，因為北京政府意圖顛覆東南亞國家的政府，不僅支持該地區的武裝叛亂、動員海外華僑的「第五縱隊」、宣傳撒播毛澤東意識形態，並且幾乎與每個領土鄰接的國家製造邊界爭議和衝突。但是，情勢有了相當程度的轉折，今天中國不再出口革命和武器，反而極力表達善意並出口廉價的消費財（consumer durables）。那麼，何種原因刺激了中國與東亞國家的新接觸？如果回顧歷史，那麼1990年代期間的情勢發展是促成中國政策改變的主要催化劑。

第一，亞洲國家對天安門事件的態度。不像國際社會對1989年6月4日中共以武力鎮壓天安門群眾事件激起強烈的反應，許多亞洲國家並沒有制裁或排斥中國。只有日本明白地譴責中共使用武力。南韓政府只是表達「事件令人遺憾」，而東南亞國家則保持沈默，或是泰國和馬來西亞政府則認為這是「內部（國內）事務」。而日本一方面在排斥中國的態度上保持沈默，另一方面則於1990年在美國德州休士頓舉行7國高峰會議時宣布，不再參與制裁的過程。⁷⁹之後，東南亞國協（簡稱東協，ASEAN）國家對待中國的方式是實施外交接觸政策而非孤立中國。新加坡雖然比其他東南亞國家對中共有較多的批評，但也是此項接觸政策的發動者和促成者。東協國家不像世界其他國家孤立中國，反而在這個關鍵時刻有如此的舉動，的確讓北京政府領導人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亞洲金融危機時的中國反應。當1997年到1998年東南亞國家發生金融風暴時，中國擔心這種現象會蔓延（傳染）到中國而造成其脆弱的銀行體系易受傷害而不穩定。雖然中國對人民幣嚴加控制、人民幣也不能與東南亞國家貨幣兌換，再加上中國有大量的外匯存底，其實不必過度憂慮，但中國政府負責任地採取行動，宣稱不會貶值人民幣，並提供援助計畫和低利率的貸款給

⁷⁹ Seiichiro Takagi, "The Asia-Pacific Nations: Searching for Leverage," in Ramon H. Myers, Michel C. Oksenberg,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Making China Polic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pp. 241-268.

一些東南亞國家。這些行動不僅讓東南亞國家心存感激，而且與國際貨幣基金（IMF）及國際信貸者強硬且近乎獨裁的態度相較實有天壤之別。中國的適時援助中斷（punctured）了東南亞地區過去對其所抱持的不良印象（冷漠或霸道），取而代之的則是負責任的強權。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政策確對解除金融危機有幫助。而這種行動的成功助長了中國領導者的信心：在區域行為者之間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⁸⁰

第三，中國重新評估區域性多邊制度。從1997年到2001年期間，中國調整了其對區域（尤其是與安全有關的）多邊組織的評價：從懷疑、不確定、到支持。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把區域內的多邊組織視為美國潛在的工具。但在派遣人員參與觀察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亞太安全合作會議（the Council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CSCAP）、以及非政府組織第二軌道會議後，中國外交部長變得更「不可知論」（agnostic），也更開放去學習了解這些組織與會議。同時，中國分析家也發現，美國並未控制這些組織。而中國更清楚的是，相反地，美國傾向於解散或忽略這些組織。另外，中國派往參加這些組織的代表們進一步發現，這些組織在東協及日本的推動下所採用的安全合作方式，與中國提出的新安全概念（new security concept）竟然彼此相容。

新安全概念最早是由外交部長錢其琛於1996年提出，國家主席江澤民則在1999年3月於聯合國裁軍會議上做了更周全的解釋。其實，新安全概念並不算新穎。本質上，它是「和平共存五原則」（由周恩來於1955年提出）的重新包裝而已。除了此五原則⁸¹外，新安全概念的核心目的是「站在平等的地位進行對話、討論和協商……解決爭端並保護和平。只有在發展新安全概念和建立公平和理性的新國際秩序下，世界和平和安全才能基本地獲得保證」。⁸²到了1999年與2000年間，中國已從更大程度的接受變為全面的參與區域性多邊

⁸⁰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Winter 2004/2005), p. 68.

⁸¹ 和平共存五原則包括：（1）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2）不侵略；（3）不干涉每個國家的內部事務；（4）平等和相互利益；（5）和平共存。

⁸²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2000* (Beijing: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2000), p. 8.

組織（同時，中國也更深入地整合到一些國際組織中）。所以，在相當短的期間內，中國從被動和懷疑到主動接觸區域體制和制度。

第四，中國對結盟的態度。1997 年間，一群中國外交官和軍事將領巡迴訪問亞洲時，提出撤廢所有國際結盟的看法，認為這是冷戰時期留下的不必要遺跡。雖然他們真正的用意何在並不清楚，但這些中國代表們主張「冷戰時期以結盟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可以由新安全概念完全取代。他們認為，冷戰時結盟的形成是為對抗蘇聯，而今已沒有必要，因為蘇聯已經不存在、冷戰已經結束。不過，一些亞洲政府私底下但嚴肅地告訴北京政府，中國的這種主張不受歡迎，而且他們沒有意願切斷與美國的結盟關係。這些回應讓中國官員意想不到、感到意外，因為他們顯然並未預料到，其他國家會如此肯定地仍然願意與美國保持安全上的連繫。因而，在短短 1 年內，中共冷卻了此議題的公開言論。⁸³

第五，中國再度確認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原則。1999 年美國空軍誤炸塞爾維亞（前南斯拉夫）的貝爾格勒（Belgrade）中國大使館後，中國立即引發激烈的辯論有關鄧小平的格言：中國國際和國內的指導原則是應當繼續和平與發展。然而，美軍誤炸事件後，許多中國人開始懷疑鄧小平的格言是否繼續有效，因為引起了爭辯。經過了幾個月的熱烈討論，中國領導階層終於達成共識：儘管仍有一些全球性的矛盾以及美國並未式微，但鄧小平的指示仍然正確無誤，繼續為中國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⁸⁴等到 2000 年 11 月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當時佛羅里達州有選務上的爭議且正在重新計票），中國國內的辯論也隨著終結。中國政府決定，不管誰最後當選美國總統，避開這類的爭辯是與美國維持良好關係的開始。而 2001 年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後，中國官方和學界仍然繼續堅守和平與發展原則。除了台灣情況例外，中國官方認為，中國的區域安全環境，一般而言，非常溫和且沒有威脅。這可從中共 2004 年的國防白皮書及每年的評估報告中得到證明。⁸⁵

⁸³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p. 70

⁸⁴ David Finkelstein, *China Reconsiders Its National Security: The Great Peace and Development Debate of 1999* (Alexandria, Va: CAN Corporation, 2000).

⁸⁵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pp. 71-72

隨著 1990 年代亞洲情勢的演變，中國發展出對亞洲區域的新態度。這主要建立在四個主軸上：(1) 參與區域組織；(2) 建立戰略的夥伴關係及深化雙邊關係；(3) 拓展區域經濟的連繫；以及 (4) 在安全領域中降低不信任和焦慮。⁸⁶

首先，亞洲除了東協成立於 1967 年外，區域性組織和多邊主義的成長是近年來的發展。例如，東協加一（東協十國加中國）、東協加三（東協十國加中國、日本和南韓）、東協區域論壇（ARF）、東協願景團體（the ASEAN Vision Group）、東協資深官員會議（the ASEAN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上海合作組織（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⁸⁷、以及太平洋盆地經濟會議（the Pacific Rim Economic Council）。至於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簡稱亞太經合會，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包括東亞國家和太平洋邊緣國家；亞歐會議（the Asia-Europe Meeting, ASEM）則連結了亞洲和歐洲。東亞拉丁美洲合作論壇（the Forum for East Asia 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也是連結了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一些非政府第二軌道團體（the non-government track 2 groups）也在亞洲地區非常活躍，較有名的是亞太安全合作會議（CSCAP）、東北亞安全合作對話（the Northeast Asia Security Cooperation Dialogue, NASCD）、以及香格里拉對話（the Shangri-la Dialogue，每年於新加坡的國際戰略研究所集會）。

上述的正式或非正式組織、會議或論壇，中國都非常積極地參與。而且中國本身也發起區域性對話，博鰲論壇（the Boao Forum，每年於海南島召開）由企業領袖和政府官員所組成，而參加 2003 年和 2004 年的會議代表都超過 1000 人。中國參與這些組織和對話的增多，反映出中國日漸了解這些制度既非真正地對中國懷有敵意，也並非為限制中國而設。相反地，中國已經明瞭，這些團體不但對中國的觀點和影響保持開放的態度，而且還有某些作用限制美

⁸⁶ Ibid., p. 72.

⁸⁷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於 2001 年 6 月，由「上海五國」（the Shanghai Five）團體（由中國於 1994 年發起）演變而成。目前上海合作組織包括的成員有：中國、哈薩克、吉爾吉斯、俄羅斯、塔吉克、以及烏茲別克。

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另外，中國涉入更多的多邊論壇或組織也代表著對規範觀點的融合：中國與東協以及上海合作組織之間的互動能以多邊形式運作。並且，共識建立和團體決定的「東協方式」(the ASEAN Way) 中國也可以接受。

88

在所有上述的區域組織中，中國最深入參與互動的是東協和上海合作組織。其目的是「把東協加三的合作與上海合作組織當作兩個焦點，中國將努力開拓區域合作，並追求建立區域合作架構以符合區域的多樣性特徵」。⁸⁹而在實際互動上，中國近年與這兩個區域組織也發展出良好的關係。⁹⁰

其次，中國在建立戰略性夥伴關係和改善雙邊連繫上也不遺餘力。中國外交態度的改變促使了中國官員和鄰近國家官員(文官和武官)舉行更多的會議和意見交換。領袖高峰會每年舉辦，部長和次級部長會議的舉行也成為慣例。低階的外交官像傘狀般在許多亞洲國家積極從事友好活動，例如：參加學術或政策相關的研討會、促進經濟上密切的連繫、開發海外華僑社區、接受地方媒體採訪、以及建立親善關係等。另外，中國積極從事外交成功的例子，包括：在上海主辦 2001 年的亞太經合會年會；新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2003 年曼谷舉行的亞太經合會上引起媒體密切的注意；以及 2004 年 9 月初，北京舉辦亞洲政黨第三屆國際會議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sian Political Parties)，來自 35 個亞洲國家、81 個政黨、共 350 位代表一起共襄盛舉。⁹¹

中國想要改善區域關係的態度最明顯不過的是與亞洲三個國家的密切接觸，分別是南韓、越南和印度。第一，就南韓而言，中國與南韓於 1992 年建交後，雙方貿易關係加強：中國目前是南韓最大的貿易夥伴，而南韓是中國第 3 大貿易國，也是中國第 5 大外國直接投資國。2003 年兩國的貿易總額為 632 億美元。中國與南韓互動增強，除了經濟動機外，還有戰略上的考慮。加強雙方的連繫可以抵銷美—南韓結盟對中國的威脅，並阻止日本企圖在朝鮮半島的

⁸⁸ Ibid., pp. 73-74.

⁸⁹ Fu Ying, "China and Asia in the New Period,"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No. 69 (September 2003), p. 6.

⁹⁰ 有關實際情況，請參考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pp. 74-78.

⁹¹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pp. 78-79.

影響力。同時，中國與南韓雙邊關係的強化，對未來北韓問題的六邊對談（包括中、日、美、俄及南、北韓）也有助益。⁹²

第二，中國與越南關係正常化是在 1991 年。雙邊貿易成長幾乎 3 倍：從 1996 年的 11 億美元、到 2001 年的 30 億美元、進而於 2003 年達到 46 億美元。中國也提供越南低利率的貸款以整建中國在越南建造的工廠。同時，中國也在越南投資 320 個聯合開發計畫共 3 億 3000 萬美元。除了經濟關係外，中國與越南先於 1999 年 12 月簽定領土邊界條約，再於 2000 年 12 月簽定東京灣的領海邊界條約。同時，雙方也成立論壇共同討論西沙及南沙群島問題。而且兩國都是南海行為準則（the Code of Conduct on the South China Sea）及 2002 年中國與東協親善和合作條約（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的簽署國。⁹³

第三，就中印關係而言，雙方於 2003 年 6 月簽署合作宣言以及九項雙邊合作的議定書。此外，雙方共同達成「實際控制線協定」（the Agreement on the Actual Line of Control），承諾協商 34 年來領土邊界的爭端並和平解決。而且，印度再度表明，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保證不支持流亡在印度西藏分離份子的活動。而中印雙邊貿易於 2003 年已達 76 億美元。⁹⁴

從中國與南韓、越南和印度改善關係的角度看，經濟互惠固然是個因素，但化解或減緩政治及領土的爭議也是中國努力的目的所在。顯然地，中國與這三國的互動關係仍具正面的意義與效果。

再者，中國積極拓展亞洲區域的經濟連繫。根據中國官方關稅統計，中國與其餘亞洲國家於 2003 年的貿易額是 4950 億美元，比 2002 年增加了 36.5%。而據 2004 年前 8 個月的統計，中國對 13 個鄰近國家出口成長了平均 42%，進口則平均成長了 66%。另外，中國官方資料顯示，這段期間中國與印度的貿易上升到 85%；與日本 27%；與馬來西亞 35%；與菲律賓 47%；與南韓 46%；與俄羅斯 32%；與泰國 38%；與越南 58%。不過，儘管成長速度驚人，但中國仍未主宰東亞的貿易。根據 2002 年的資料，整個區域從中國的進口比率只

⁹² Ibid., pp. 79-80.

⁹³ Ibid., pp. 80-82.

⁹⁴ Ibid., pp. 82-83.

有 9%，從日本進口的則大約為 17%，而美國則將近 18%。另外，中國接受亞洲國家的直接投資也日漸增多。大約 70%的外國直接投資來自亞洲。當然，中國也開始直接投資其他亞洲國家，雖然金額上不高，2003 年大約 15 億美元。

95

不可否認地，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亞洲經濟成長的引擎。亞洲國家在中國繼續經濟成長和穩定上有很大的賭注。也就是說，中國經濟上如果表現不佳，連帶地會影響並造成其他亞洲國家經濟的不景氣。不過，仍有一些觀察家對中國日益增長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s）持保留的態度（亦即，一旦中國強大之後，就會對亞洲鄰國造成傷害）。而中國對此的回應則是：中國是隻「友善的大象」（friendly elephant），興趣只在與鄰國維持雙贏的商業關係。但其他亞洲國家則擔心這隻大象，不管多友善，在走過的路上仍會留下被踐踏的草皮。⁹⁶

最後中國對區域安全的態度不想造成鄰近國家的不安。針對國家和區域安全議題，中國採取單邊、雙邊及多邊三管齊下的方式與手段。基本上中國採用單邊方式加速其軍事現代化目標。其中兩個主要目標分別是：（1）建立和裝備全面現代化軍隊，配合其大國地位；（2）發展出各種軍事能力對付台灣。

不過就中國 PLA 發展來看，一方面進步不大，另一方面不是優先重點。例如，沒有建造航空母艦、只有建造幾艘（很少）驅逐艦在領海航行、沒有海外軍事基地、在公海和遠離海岸處進行軍事演習的情況很少、沒有製造長程的轟炸機、沒有裝備空中指揮和命令的作戰機等等。即使中國目前擁有大約 60 艘戰鬥艦和超過 70 艘潛水艇，但活動範圍都沒有超越中國領海之外。所以，沒有明顯的證據顯示，中國 PLA 正在發展的軍事能力已超越其領土邊界。⁹⁷

另一方面，在建立對台武力上，爲了降低鄰國對區域安全的憂慮，中國採取雙邊以及多邊的方式以獲取這些亞洲國家的信心。基本上，有四種主要的形態。第一種形態是雙邊性與一些鄰近國家（如澳洲、印度、日本、哈薩克、蒙

⁹⁵ Ibid., pp. 83-84.

⁹⁶ Michael Vatikiotis, "A Too Friendly Embrac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17, 2004, pp. 15-18.

⁹⁷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pp. 85-86.

古、巴基斯坦、俄羅斯以及泰國)進行政府間安全對話。這些雙邊對話都是每年舉行一次。而且,中國也參加一些非官方第二軌道的安全對話,通常是在中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和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此兩個單位都與 PLA 人事處第二局有關)舉行。⁹⁸

第二種形態接觸是正式軍方對軍方的交流。中國 PLA 近年來與鄰近國家從事一連串交流。參與的軍方人士來自國防部、軍方下屬單位、軍事學院、以及區域軍事單位。尤其與過去相異的是,中國已經願意進行雙邊軍事演習,打破了過去 54 年來的禁忌。中國於 2003 年分別與印度、哈薩克、及巴基斯坦(另外也與法國和英國)舉行聯合演習。其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是,中國與俄羅斯史無前例地計畫於 2005 年秋天在中國領土舉行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這個演習將包括地面部隊、空軍、指揮命令單位,同時也可能包括戰略性飛彈。⁹⁹

第三種形態則是中國積極參與東協區域論壇(ARF),因為中國政府將其視為建立區域合作安全體的潛在催化劑。胡錦濤於 2004 年 4 月在博鰲論壇的開幕典禮演說中提到,中國「將全力參與現有的多邊安全機制,而且做好準備與其他亞洲國家設立一個安全對話機制,以積極促進軍事領域信心建立的合作」。¹⁰⁰接著 7 月時,東協於印尼雅加達集會並提議召開安全政策會議(這是回應前一年中國於 ARF 部長會議時提出的建議)。結果該年 11 月初於北京舉行安全政策會議,這是 ARF 架構中區域軍事官員最高層級的會議。¹⁰¹

第四種形態就是中國逐漸增加其軍事透明度。方式之一就是近年來發布及出版一些國防白皮書。中共如此做的其中部分原因是回應東協、日本和南韓等國不斷要求下的結果。雖然這些白皮書的內容未能達到世界的標準,甚至也比不上其他的亞洲國家,但已經逐漸有進步並能提供愈來愈多的中國軍方資訊。而最近出版的國防白皮書(2004 年 12 月)則比以前提供更多的資訊,其中包含:PLA 信條與國防政策、技術創新和國防工業、國內國防動員、軍力的現

⁹⁸ Ibid., p. 87.

⁹⁹ Ibid.

¹⁰⁰ Hu Jintao, "China's Development Is an Opportunity for Asia," speech at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2004 annual conference, Sanya, Hainan, April 24, 2004, <http://www.chinaview.cn>.

¹⁰¹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pp. 87-88.

代化 (streamlining)、對台灣的關心、以及 PLA 的國際合作。¹⁰²

運用以上的方式，過去幾年來，北京政府參與區域安全事務的層次以及信心已經相當程度地增加與成長。雖然亞洲鄰近國家仍免不了存有疑慮，不過在中共的努力與誠意下，這種疑惑已經消散許多。而中國提出的新安全概念也無形中助長了中國在這些國家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因此，胡錦濤在 2004 年的博鰲論壇演說中再度重申新安全概念的指導原則，並表達中國希望建立一個安全與合作的關係，而其特點是不結盟、不衝突與不針對任何國家。¹⁰³總結而言，這些行動已在亞洲的區域動態中產生出轉變中的效果 (a transforming effect)。百年以來，中國大部分時間都在區域秩序之外，而今它已經發現立足點，並且在所有的領域和議題上重新肯定自己。¹⁰⁴

捌、結論

上述的討論中，美國政界、媒體及學界的一些人士對中國持負面的形象，但從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表現並與亞洲國家建立和發展正常且穩定的合作及夥伴關係，則又令人產生對中國的正面形象。到底中國是包藏禍心還是美國的負面形象認知錯誤 (misperception)，似乎見仁見智、互有爭論。不過，中國威脅論值得進一步省思。

就中國威脅論的三個觀點而言，首先，中國並沒有以民族主義取代共產主義向世界推銷宣傳來打擊美國的資本主義。至少許多亞洲國家沒有忘記提醒中共，他們不願意放棄與美國的結盟。其次，中國的經濟發展尚在起步階段。在實力上，中國仍不足以對抗美國與日本。尤其，中國所擔心的是國內景氣過熱、貧富懸殊過大。當今，中共絕不以目前的成就而志得意滿、沾沾自喜而想獨大妄為。同時，中國也知道加強與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是刻不容緩之事。而在經濟合作的過程中，避免發生衝突是中國著力重點。這也是為何中國與東協密切

¹⁰²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04*.

¹⁰³ 引自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p. 89.

¹⁰⁴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p. 89.

接觸的主要原因。再者，中國 PLA 的現代化不但資源不足，而且目前也未以發展攻擊性軍力或武裝為要點，自然還談不上對美國的威脅。雖然中國分別與許多鄰近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但在演習過程中，允許印度及巴基斯坦海軍在中國沿海附近執行搜救行動、讓哈薩克軍隊跨越中國邊界進行反恐行動，¹⁰⁵實在看不出中國有以演習之名而行進攻之實的動機與目的。至於中國意圖進行電子戰和資訊戰攻擊美國的說法，也言過其實。試想中國傳統軍力的武裝和現代化已嫌不足，又如何會有龐大的經費耗在電子和資訊的戰爭研發上。總之與事實比較並從邏輯思考，中國威脅論在目前尚未有足夠證據支持。

並且，在短暫的未來，稱中國是修正型強權也是言過其實。當然，令中國威脅論人士最為擔心的是，中國武力犯台。然而，中國目前最主要的優先考慮順序是經濟發展，而非風險性戰爭。中國威脅論主張，共黨中國是危險和侵略的。但如果台灣不宣布獨立，中國是不可能與台灣交戰的。換句話說，如果台灣海峽發生戰爭，那是因為台灣宣布獨立。不幸的是，很少美國學者討論或分析這種景象。¹⁰⁶另外，美國一些觀察家認為，中國與亞洲的接觸是一種冷酷無情的零和（zero-sum）嘗試，想取代美國成為區域中主要的強權。因而，有些人士甚而主張，在中共尚未能真正挑戰美國的卓越之前，以先發制人的方式圍堵中共。這種計策乃是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密爾斯海默的「攻擊性現實主義」理論。如此諷刺的是，美國反而是修正型國家（並非中國），另一方面攻擊性現實主義的邏輯與應用也站不住腳。這正好是國際關係理論家古典式作法的例子：以演繹的方式將理論應用在實際情況，卻沒有站在區域研究的基礎上，用歸納的方法根據證據而衍生出理論。換句話說，攻擊性現實主義是以理論演繹出尚未證實的假設，而不是以歸納法蒐集證據而導出結論。

當代的國際關係不只是涵蓋大國之間的關係而已，而且大國之間的互動也不真正地純屬零和遊戲。反而，大國之間的互動交織成複雜性的相互依賴、競爭中的合作、以及結構性的調整。某國（中國）的崛起並不一定導致另一國（美

¹⁰⁵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p. 87.

¹⁰⁶ Enbao Wang, "Engagement or Containment? American's Views on China and Sino-US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1, No. 31 (2002), p. 390.

國)的衰落或相對式微。而且崛起的國家也不必然尋求霸權的主宰。同時,崛起的大國並非不可避免地會挑戰目前的大國,進而造成結構性的衝突(如權力轉移理論所預言)。所以,將中國類比以前的崛起國家(如納粹德國)不但不適合當代中國,而且根據過去的歷史,中國也沒有這種經驗。¹⁰⁷

雖然從邏輯分析和實際參照,中國不應稱為修正型大國,但近來「中國威脅」的言論又連續不斷的再度出現。例如,2005年6月下旬,持續一個星期,美國天天都有關於「中國崛起」的各項研討會、記者會及聽證會。美國國會就有多場關於中國的記者會和各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而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舉辦的「美國海軍的未來」研討會中,每一場問答的重點都沒有脫離中國崛起和台海問題。基本上,美國認為,中國還不是威脅,但是不可不察。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研究員卜大年指出,美國的政、學界從專注於伊拉克與阿富汗,到開始注意中國的崛起,是從今年(2005)1月開始的。他認為,這個趨勢仍將繼續下去,短期內會有點緊張。¹⁰⁸

不過,有趣的是,中國威脅論雖然再現,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並沒有以支持台灣來牽制中共的論點。¹⁰⁹過去,中國威脅論主張,「中共武力犯台」造成威脅,但沒有明確指出,這是否是因為台灣宣布獨立而造成「武力犯台」,似乎給台獨思想有生存與想像的空間,以為只要「中共武力犯台」,美國就必然會出面干涉。因此,中共想「武力犯台」因為台獨思想茁壯擴大,但礙於美國對台灣的保護,只有坐視其發展。而今,中國威脅論不再包含支持台灣的論點,也就表示,台灣的安危不再是中國威脅和美國出兵的重點,相對地降低了台獨思想的氣焰。在此情況下,中共武力犯台的機會就更小,中國威脅論的主張與理由也就變得更不充分。所以,如果中國繼續遵循著「和平與發展」路線,透過對話與接觸,也許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因而改觀,那麼中國就不再被視為修正型強權,而變成現狀型國家了。

¹⁰⁷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p. 94.

¹⁰⁸ 《聯合報》,2005年6月27日,版A13。

¹⁰⁹ 同上註。